

档案解密·

美国学术界对中央情报局与危地马拉政变研究综述

高慧开

内容提要 1954年危地马拉政变是美国利用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对拉美国内部事务进行干涉的一个开端。由于这一事件所涉及档案文件的解密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所以对它的研究也是逐渐从原地踏步的初始阶段到六七十年代修正主义的起步阶段再到80年代以伊默曼的力作《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为代表的实质性发展阶段，最后过渡到90年代至今大部分原始文件已经解密的深入研究时期，当今时代急切呼唤“解构”这段历史的大作问世。

关键词 中央情报局 秘密行动 危地马拉政变 修正主义观点

美国外交决策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中央情报局，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往往被认为是一个神秘的王国与学术禁地，无人敢问津，也无人能问津。可时过境迁，作为冷战重要工具的中央情报局随着冷战的结束在逐渐进行体制改革与功能转换，半个世纪前的冷战初期档案文件开始解密，美国学术界对中央情报局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手策划的危地马拉政变，是美国利用秘密行动对拉美国内部事务进行干涉的一个开端。如果说杜鲁门总统只把中央情报局当作收集情报的行政机构而建立的话，那么艾森豪威尔总统又把它升级为对外进行干预的一个工具。

把拉美作为自己的“后院”已经成为美国决策者的一种传统观念：从《门罗宣言》演进到门罗主义和泛美主义；与拉美的现实政治相适应的美国学术界对拉美国、尤其是对美国与拉美国家关系的研究，业已形成一种传统文化。作为冷战后美国干涉拉美国内政滥觞的针对危地马拉政变的“成功行动”，自然在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之内，半个世纪以来对此的著述一直未断，而且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导致危地马拉总统阿本斯下台的一系列事件几十年来激发了学者们的兴趣：“成功行动”究竟对阿本斯的胜利有多大的重要性？艾森豪威尔对此秘密行动知晓多少？为什么艾森豪威尔总统要让阿本斯辞职？联合果品公司在本次干预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阿本斯是共产主义者吗？共产党在危地马拉

有多大的影响？它依附于苏联吗？简而言之，在中美洲确实存在一个艾森豪威尔当局要认真除去的共产主义威胁吗？或者说反对共产主义仅仅是推翻一个威胁美国霸权的民族主义政权的借口吗？学者们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形成了冷战期间美国对外政策评价上的各种主义与观点。

2000年11月，斯蒂芬·M·斯特里特在《历史教师》上发表了《对1954年美国干预危地马拉的解释：现实主义、修正主义和后修正主义的观点》一文，对美国学者研究中央情报局与危地马拉政变的问题进行了一次理论性较强的概述，他将研究者的观点归结为三种：现实主义、修正主义和后修正主义。斯特里特对研究观点的归纳，无疑为我们全面了解美国学者围绕这一问题所作的研究深度提供了方便，但是就研究的广度来说还需要配合时段来划分。根据时代背景和资料来源及研究成果上的差异，我们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是初始的解释说明阶段；从60年代到70年代末是研究有所突破的起步阶段；80年代是研究的发展阶段；90年代至今，尤其在90年代末此项研究工作走向深入。

一 研究的初始阶段

由于危地马拉政变刚刚结束，研究的初始阶段要对此做高质量的研究是不可能的。一是因为研究

收稿日期：2006-06-08

作者简介：高慧开，男，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边防系副教授，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2004级博士研究生。（武警学院科研所，廊坊 065000）

Stephen M. Streeter, "Interpreting the 1954 U. S. Intervention in Guatemala: Realist, Revisionist, and Postrevisionist Perspectives", *The History Teacher*, Vol. 34, No. 1, Nov. 2000, pp. 61 - 74.

所用的资料仅仅限于官方的公共政策和媒体报道；二是中央情报局本身是一个秘密组织，档案的保密制度非常严格，这就构成了研究的一个瓶颈；三是此时正值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之后、国际上美苏冷战骤然升温的时期，研究者必然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所以出现反共的现实主义观点，也是时代的一个必然产物。现实主义的历史学家，如反共的丹尼尔·詹姆士、罗纳德·施奈德和约翰·马茨，谴责侵略、扩张的苏联帝国挑起了冷战，因为他们相信阿本斯是苏联的傀儡，他们认为推翻他的政权就是把共产主义从西半球推回去，研究的成果基本上是对美国政府政策的解释说明甚至美化。例如，1955年纽约展示出版社出版的《危地马拉历史概况》一书，作者艾米·伊丽莎白·詹森就公开站在美国政府的立场，竭力歪曲危地马拉政府实行的民族主义改革，为中央情报局的军事干涉多方辩解，在此书的目录中就明确指出“共产主义从危地马拉向外蔓延”。其他的著作还有卡尔曼·A·西尔弗特的《危地马拉政府研究》（1954年）、约翰·J·马茨的《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渗透》（1956年）、罗伯特·亚历山大的《拉美的共产主义》（1957年）、梅·斯泰西和G·普拉扎的《在拉美的联合果品公司》（1958年）、罗纳德·M·施奈德的《1944~1954：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1958年）。这一时期的研究还谈不上是真正的研究，其引用的资料与发表的观点与事件发生时官方的发布同出一辙，没有什么区别，尚处于原地踏步的状态。

二 研究的起步阶段

这一时期由于“新左派”的兴起与越南战争的教训引发了历史学家们对盛行的冷战教条产生了怀疑，以及70年代依附论的兴起鼓励着拉美学者把美国干预危地马拉的事件视为经济中心区支配边缘地区的一个例子，使得修正主义观点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美国学术界逐渐得到认可。修正主义的历史学家认为冷战的大部分责任在美国，强调华盛顿寻求扩张到海外尤其是第三世界市场、促进对外投资的性质，断言国务院营救联合果品公司、美国对危地马拉的干预就是经济帝国主义的一个典型例子。从研究的课题就可以看出美国学者们在开始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深刻的检讨与反思，部分学者还从经济动机的角度分析政府的决策。例如，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理查德·J·巴尼特、乔伊斯

和加百利·科尔科就认为美国通常反对第三世界的民主，“门户开放”政策导致了美国为了保护贸易与海外市场对拉美等不发达地区进行了无数次的干预。这方面的著作有：约翰·杰拉西的《巨大的恐惧：拉美人重新夺回了拉美》（1963年）、美国大学特殊军事行动研究办公室的《对叛乱和革命战争的案例研究：1944~1954年的危地马拉》（1964年）、怀斯、大卫和托马斯·罗斯的《看不见的政府：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情报》（1964年）、琼斯和切斯特·劳埃德的《危地马拉的历史与现状》（1966年）、戈拉斯和曼纽尔的《剩余劳动与经济发展——以危地马拉为例》（1970年）、大卫·格林的《拉美的遏制：睦邻政策的神话与现实史》（1971年）、赫伯特·帕米特的《艾森豪威尔和美国的十字军战争》（1972年）、科尔·布莱齐尔的《盘旋着的巨人：美国对拉美革命变化的反应》（1976年）、托马斯·麦卡恩的《一个美国公司：联合果品公司的悲剧》（1976年）、何塞·艾瓦尔·德索托的《依附与干涉——以1954年的危地马拉为例》（1979年）。

修正主义观点的流行在20世纪80年代初达到了高峰，其标志是《苦果——未曾披露的美国策划危地马拉政变的故事》（1982年）一书的问世。此书是两名新闻记者斯蒂芬·施莱辛格和斯蒂芬·金泽尔撰写的，他们详细描述了联合果品公司如何与艾森豪威尔当局共谋把阿本斯拉下台的，他们坚持认为联合果品公司在此政变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如果说该公司不把阿本斯赤化并夸大共产主义威胁的话，艾森豪威尔当局可能就不会重视危地马拉的政局，公司与政府官员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使联合果品公司能够对华盛顿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些看法显然是切中要害的中肯观点，只是缺乏进一步论证的一手资料，较多地使用推理得出结论而影响了该书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三 研究的发展阶段

与《苦果——未曾披露的美国策划危地马拉政变的故事》一书几乎同时出版并对施莱辛格和金泽尔的共谋理论提出挑战的是由理查德·H·伊默曼基于“成功行动”档案资料撰写的专著《中央情报局

Amy Elizabeth Jensen, *Guatemala: a History Survey*, New York, Exposition Press, 1955, contents.

在危地马拉》(1982年),此书赞同阿本斯政权并没有对美国构成苏维埃威胁的修正主义观点,也揭示了中央情报局的后勤援助对于阿本斯的重要性,但是伊默曼认为艾森豪威尔当局之所以要决定清除阿本斯,并不是因为联合果品公司游说的压力,而是由于美国官员把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混为一谈,国务院没有了解到阿本斯是一个为阻止而不是鼓励共产主义传播而实施土地改革的“中产阶级”改革家。伊默曼强调的是误解导致了阿本斯的下台,是心理状态、官僚政治和文化偏见形成了华盛顿对危地马拉和其他地区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观念。后修正主义史家是从战略与经济相结合的因素解释冷战,他们更注重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影响上论述华盛顿对共产主义威胁的误读,据此理论,艾森豪威尔当局转而反对阿本斯是因为他们没有理解他是一个民族主义代表而非一个共产主义者,即艾森豪威尔总统与他的顾问们按照思维习惯混淆了发生在第三世界的反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历史学家罗纳德·W·普鲁森在1985年9月出版的《激进的历史评论》上撰文《第二个修正主义》,认为伊默曼对反共的描述过分地夸大了,他想搞清楚“政治、战略、经济、心理和(或)意识形态因素如何联合”导致华盛顿要去掉阿本斯。罗伯特·弗里曼·史密斯在1983年的《美洲历史评论》上指出伊默曼的写作是基于国家档案、各种手稿、口述历史记载和对许多前美国官员的采访,他认为即使没有美国介入,反共的危地马拉人也将会废黜阿本斯。此书对美国政策持有过分简单化的观点。

伊默曼的《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确实成为这个时期的一本划时代的力作,其影响极大。他引用的资料中增加了不少口述的记录,也开始从心理和文化层面认识这一历史之谜。笔者认为,一方面伊默曼采用了多种形式的新资料去揭示事件真相,而且从政治、经济角度的分析深入到了内在的文化视角,是对此问题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另一方面我们应当认识到伊默曼认为艾森豪威尔当局决定清除阿本斯是由于美国官员把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混为一谈,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在本质问题上掩盖了美国政府当局的错误做法,是一种巧妙维护官方立场的御用说辞。

随着政府文件的逐渐解密与当事人的离职或去世,研究的资料在不断增加,观点也呈现出综合与多样的特点,出现了不少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中央情报局的专著和论文。1981年由美国艾森豪威尔文

件集的编辑斯蒂芬·安布罗斯撰写的著作《谍战伴随艾森豪威尔》问世。此书用大量史料描述了艾森豪威尔在担任二战期间盟军最高统帅和美国总统时期对美国情报机构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艾森豪威尔任总统后利用中央情报局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动秘密战争,使中央情报局成为美国总统执行对外政策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有力武器。另外的著作还有希尔·布哈德拉·亚吉的《中央情报局对第三世界的军事行动》(1985年)、约翰·普拉多斯的《总统秘密战》(1986年)、威廉·布卢姆的《一段被遗忘的中央情报局史》(1986年)、乔治斯·A·福里奥尔和伊夫·洛瑟的《危地马拉的政治之谜》(1988年)、罗德里·杰弗里·琼斯的《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民主》(1989年)、劳伦斯·C·索利的《无线电战争》(1989年)。

1986年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一篇硕士学位论文《美国在1954年推翻杰科博·阿本斯中的作用》认为,1953年和1954年,美国公民被一种观点所说服:危地马拉政府的阿本斯总统给美洲带来了一种可怕的共产主义威胁。但依据《信息自由法》公布的政府文件显示上述威胁并不存在。事实的真相是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及其执行部门共同策划废黜了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总统。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知情与认同下,国务院的杜勒斯及其弟弟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发动了一场反对危地马拉的战役,从此可以看出,艾森豪威尔比此前想象的要更加复杂与专横,是一个政治掮客和国际政客。这些观点来自危地马拉受内战之苦而移民最多的加利福尼亚州,作者依据当时解密的最新文件得出了客观而正确的结论。

还有的学者认为,美国干涉危地马拉是“杜鲁门主义遏制共产主义的第一个试验”。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冷战思维,与历史事实有着较大的出入。

Richard. H. Immerman, *The CIA in Guatemala: the Foreign Policy of Interventio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2, p182.

Stephen M. Streeter, "Interpreting the 1954 U. S. Intervention in Guatemala: Realist, Revisionist, and Postrevisionist Perspectives", *The History Teacher*, Vol. 34, No. 1, Nov. 2000, pp. 61 - 74.

Robert Freeman Smith,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8, No. 3, Jun. 1983, pp. 781 - 782.

Gordon L. Bowen, "U. S. Foreign Policy Toward Radical Change: Covert Operations in Guatemala, 1950 - 1954",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 10, No. 1, Winter 1983, p. 89.

四 研究走向深入

斯特里特认为，后修正主义者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在推翻阿本斯政权的问题上忽略了危地马拉人自身的作用，而1991年皮罗·格莱杰塞斯的《破碎的希望：危地马拉革命和美国（1944~1954年）》一书的出版大大地弥补了这一局限性。此书披露了许多新资料，阐明了三个重要问题：一是提供了在危地马拉共产主义威胁的更加清晰的画面；二是证实了后修正主义者的主张——艾森豪威尔当局的官员认为联合果品公司的困境只是一个“附属”问题，与共产主义问题相比是次要的；三是艾森豪威尔当局就阿本斯土地改革对联合果品公司的影响和对农村的影响相比，对前者的考虑要较少，因为有情报表明土地改革将“动员至今迟钝的农民支持当局”，并“给共产主义者提供像组织其他国家工人那样组织该国农民以扩大其影响的机会”。格莱杰塞斯的分析具有创新的一面，也有微观解析事件背景的显著特点，但是他的出发点是维护美国政府的冷战政策，也淋漓尽致地把冷战思维引进到了学术研究之中，因此得出了与历史事实相反的结论。亚伯拉罕·F·洛温塔尔认为，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组织颠覆的短命的阿本斯政府是危地马拉历史上最好的政府，并认同格莱杰塞斯的一个主要观点：是美利坚“帝国的傲慢、安全的考虑和经济利益共同相互作用”导致了危地马拉历史上这一血腥的悲剧。

《破碎的希望：危地马拉革命和美国（1944~1954年）》似乎成为美国干预危地马拉的定论，但是随着90年代末中央情报局公开新的档案文件，围绕美国在推翻阿本斯作用上的一些谜团将会逐渐解开。1992年中央情报局雇用历史学家尼古拉斯·卡拉塞编纂官方版本的《成功行动》，同时研究中央情报局的历史学家杰拉尔德·海恩斯也撰写了一份单独的关于中央情报局针对危地马拉政权暗杀图谋的报告，这两个研究成果直到1999年才公开出版。卡拉塞的研究是通过情报组织的视角出发，他像其他后修正主义者一样，不重视联合果品公司的作用而突出安全的考虑：是中央情报局而不是联合果品公司劝说国务院关注危地马拉的。此项研究还对两个重要历史问题提出了新的证据：一是为什么中央情报局选定阿本斯而不是其他军官领导“解放军”；二是“成功行动”对阿本斯胜利的重要性。卡拉塞认同阿本斯的下台应该归因于政府军队不忠

诚的观点。在阿本斯与阿本斯之间的转换，实际上是一次军事政变，而不是一次有广大群众基础的反对共产主义的革命。卡拉塞充分利用新的档案文件认定危地马拉政变实质上是一次军事政变，得出的结论好像客观而公正，其实这种做法有把事件本身简单化到危地马拉内部事务而解脱中央情报局干涉外国内政历史重负的嫌疑。

有关美国干预危地马拉的各种评论使我们很容易得出这一主题已经穷尽研究的结论。因为有相关的一些美国原始文件记录未解密，联合果品公司还没有公开其档案，所以仍有值得填充历史记录的研究空间。当然就像对冷战起源的长期争论不休一样，对美国干预危地马拉的辩论也不可能单纯因为新资料的发现而停息。斯特里特最后的结语是：关于美国干预危地马拉的历史著作已经成熟到可能比较清晰地表述导致阿本斯下台的一系列事件的地步；既然冷战已结束，如何去解构围绕这一事件的说法，将会出现很多的不同观点。

世纪之交的相关著作有《美国在拉美的干涉（1953~2000）》（1999年）、约翰·雅各布·纳特的《中央情报局黑色的军事行动》（2000年）、约瑟夫·J·特伦托的《中央情报局秘史》（2001年）、罗德里·杰弗里·琼斯的《斗篷与美元：美国秘密情报史》（2002年）、托马斯·鲍尔斯的《情报战》（2002年）、威廉·J·多尔蒂的《行政秘密——秘密行动与美国总统》（2004年）、大卫·M·巴雷特的《中央情报局与国会》（2005年），但还缺少中央情报局与危地马拉政变研究的专著。诚如美国《外交史》（2004年）上一篇文章所言：美国国务院的固定丛书《FRUS》最近出版了一卷《在危地马拉1952~1954年的政变与代号为PBSUCCESS的军事行动》，不幸的是历史学家在对待这段秘史方面显得迟钝。

进入21世纪之初，不仅是“解构”这段历史的大好时机，更应成为深入还原其本来面目的良好契机。因为档案材料的瓶颈基本上已经打破，数字化高速公路还把研究送上了快车道。在不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前提下，1992年秋公布了第一批情报资料——112份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文件。

Abraham F. Lowenthal, "The Western Hemisphere", *Foreign Affairs*, p. 176.

Haines, Gerald K., "An Emerging New Field of Study: U. S. Intelligence", *Diplomatic History*, Jun. 2004, Vol. 28, Issue 3, pp. 441 - 449.

1993年许多对前苏联评估的情报被解密,还有数千份关于暗杀肯尼迪的材料被送往国家档案馆。1994年初内定开放11个主题,其中包括40~60年代在意大利、伊朗、危地马拉、印尼、古巴、老挝、刚果和多米尼加的秘密行动。公布大量的情报资料毫无疑问会丰富美国外交史,这些文档将可能使对外决策过程与秘密行动清楚明白地显示出来。使用情报记录不仅会测定国家安全机构提供了什么样的情报,还显示出决策者是如何使用这些情报并对此作出反应的,而较好地理解中央情报局作为行政手段的角色,会为公共外交政策与冷战期间由美国总统秘密制定的政策之间进行比较提供了一种可能。文件的解密必然会使现行的相关著作重写。

相对于这一时期专著较少之外,出现在报纸刊物上的专题论文较多,其中有两篇学位论文。一篇是1993年州立圣何塞大学的硕士论文《美国,危地马拉和共产主义威胁》,该文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推翻阿本斯政权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危地马拉政府1953年没收了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土地,而是出于对苏联控制的不容许自由行动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恐惧心理;另一篇是1999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博士论文《作为外交政策工具的秘密行动——美国干涉伊朗与危地马拉》,该文分析了在总统使用中央情报局秘密干预决定中情报组织所起的作用,特别是作为情报组织的核心机关中央情报局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他们的地位去推行秘密行动的。因此,在对共产主义的威胁作出解释说明时,情报组织的角色似乎成为理解并贯彻秘密行动的关键。在美国总统对一个国家了解甚少时,他就认为外交是软弱而无效的解决方案,相反秘密活动会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两篇论文分别从心理层面和情报组织的独特功能上释读美国的干涉,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同时有将问题片面化并为官方立场辩护的特点。

艾森豪威尔在秘密战争的顶点达8年之久,中央情报局常被引证作为成功范例的是在伊朗的“埃贾克斯行动”和在危地马拉的“成功行动”。然而,这些胜利只有短期效果。伊朗行动在伊朗国王的继承人身上播下了强烈的反美意识种子;在危地马拉,推翻阿本斯恰恰使这个国家背离了秘密行动的既定目标:民主。这也是学术界一直在深入探讨的一个核心内容。美国向来是以民主、自由、人权为价值观念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其实其外交行为还包含不为多数人所知的秘密活动。美国策划政变颠覆危地马拉总统阿本斯政权的影响至今不仅在

中美洲,而且在旧金山海湾地区还有。许多人在政变后被借以共产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的名义而杀害,土地改革从此被扼杀,此后引发的长达36年的内战使20万危地马拉人丧失了生命,数十万人流离失所成为政治难民,经墨西哥辗转到达美国。所以对这一具有现实影响事件的研究,将随着中央情报局及相关方面档案的进一步解密会有更加全面而深刻的著作问世。

(责任编辑 鲁渝)

主要参考文献

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 ~ 1954*, The American Republics, Volume —, Washington, 1983.
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 ~ 1954*, Vol. —, Part 1, 2, Washington, 1984.
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 ~ 1954*, Guatemala, Washington, 2003.
4. Richard H. Immerman, *The CIA in Guatemala: the Foreign Policy of Intervention*, 1982.
5. Stephen Schlesinger, Stephen Kinzer, *Bitter Fruit: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American Coup in Guatemala*, 1982.
6. “History with Holes: the CIA Reveals its Past”, in Nelson, Anna Kasten ed.,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2, Issue 3, Summer 1998.
7. “Playing the CIA’s Tune? the New Leader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in Wilford ed.,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7, Issue 1, January 2003.
8. “Covert Operations as an Instrument of Foreign Policy: United States Intervention in Iran and Guatemala”, in Scott ed., *Harold Asbury*, 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s (PQDD) DAI - A 60/61, December 1999.
9. [美] 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著, 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译:《受命变革(1953~1956)》,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
10. [美] 费雷尔编, 陈子思等译:《艾森豪威尔日记》,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
11. 洪国起、王晓德著:《冲突与合作——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历史考察》,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
12. 徐维源著:《美国中央情报局:从罗斯福到小布什》,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

Zachary Karabell and Timothy Naftali, *History declassified: the Perils and Promise of CIA Documents Diplomatic History*, Jun. 1994, Issue 4, pp. 615 - 616.

约翰·普拉多斯著:《总统秘密战》,北京,时事出版社,1989年,第229页,491页。

Tyche Hendricks, *Coup Still Scars Guatemalans 50 Years Later / Anniversary Recalls Civil War that Sent Half - million to U.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CA), Jun. 26, 2004.